别用那些简单现成的答案盘点黄金周

曹　林

黄金周过后，迅速进入黄金周盘点时间。赚得盆满钵满的行业，低调地盘点着黄金；被逼实施免费政策的路桥公司，哭丧着脸盘点着免费带来的损失——称“长假全国收费公路减收200亿”；很多媒体也在盘点着这个长假暴露出的种种问题：高速的堵，长城的挤，华山的乱，各景点的宰客。一张张人山人海的照片确实让人触目惊心，高速上堵成一锅粥的景象确实很恐怖。

盘点的都是事实，然而一些媒体和专家在盘点后得出的答案却过于简单。比如，因为免费之后高速还在堵，有人就呼吁应该取消免费政策；因为景点人山人海，就有人呼吁取消国庆黄金周，认为景点的暴挤是这种集中休假方式造成的。

这些结论和答案，都是流行的、现成的和简单的，盘点黄金周问题需要超越人云亦云和想当然，不能拿那些现成的简单答案来反思，而需要客观和理性。

很多结论是早就准备好了的，比如路桥公司抱怨“长假全国收费公路减收200亿，让公司亏不起”——这个数字，在相关部门宣布长假高速免费后，路桥公司就已经准备好了“表现亏损程度”的数字，以作为反对免费和申请补贴的筹码。

当路桥公司带着强烈的抵触心态和受害心理来执行免费政策，总想着“少收200亿”时，刻意、报复性地采取一些添堵的手段(诸如拦车发卡收卡)，将免费政策的经念歪，就可以理解了。这个数字本想撒个娇、卖个人情、绑架一下政府、提醒公众占了多少便宜，可无意间倒是暴露了一个大秘密：一个黄金周，高速公路就能收200亿，全年365天，高速公路得赚多少钱！这可是比房地产更暴利的行业！赚钱时一声不吭，收费期早就到了该撤了也闷声不言，才免费让利了几天，就拼命地叫嚷了起来。

就算真的免了200亿，也并非真正的免费午餐。一来，车主买车时交了那么高的税费，高速费本就涉嫌重复征税；二来，路桥公司本就并非纯粹的市场化企业，而是行政和市场结盟的怪胎，一边享受着垄断红利，一边设卡收钱，收费本就不那么名正言顺。

有些结论是非常简单的，比如说，高速路出现拥堵，有人就说这是免费导致的，所以要取消免费政策。首先有必要指出，这一次高速的拥堵，有媒体过度渲染的因素。因为这是第一次实施高速免费政策，有些专家预言必然导致高速拥堵，在舆论先入为主的过度关注下，很容易在“免费”与“拥堵”间形成一种假性因果，人为地加重了“拥堵”的程度。

确实，在特定的时段，一些热门的高速路出现了拥堵。但是，多数时候、多数路段是通畅的。即使拥堵，原因也比较复杂：有的拥堵是局部性的，大城市和热门旅游城市，堵很正常；有的拥堵是周期性和习惯性的，节前出行高峰和节后返程高峰，每年都堵；有的拥堵是事故性和偶发性的，出了交通事故当然会堵；还有的是人为导致的，比如人为地拦车发卡收卡。

反对免费的人，对这些复杂的原因视而不见，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免费”。有些反对者甚至到了偏执的程度：看到哪里的高速路堵了，就无比亢奋，不管堵的原因是什么，罪名一定是免费，然后炫耀自己多有先见之明。带着先入为主的偏见，结论必然就不客观，只会选择那些符合自己偏见的信息，去论证自己的偏见，结果就是偏见不断被强化，越来越远离客观事实。

由高速车堵和景点人多推理出“应该取消国庆黄金周”，也是不动脑筋和偷懒的。两个前提需要廓清：其一，中国人多是一个事实，有时拥堵是难免的；其二，黄金周并不必然导致拥堵和拥挤，好的安排和管理制度可以缓解拥堵，比如可以采取充分的预警对游客进行分流，引导公众采取多元化的方式安排休假。确实，分时度假是一个好东西，它比黄金周制度更科学合理，可在带薪休假还无法得到有效执行的情况下，强制性的法定假日和法定性的休闲福利对劳动者是必要的。理想状态当然是分时度假和带薪休假，可理想受到种种约束时，黄金周制度是一种次优选择：无论休假质量如何，无论挤还是堵，首先起码有假可度了。

不要把中国想简单了，中国是复杂的，用市场原教旨主义那套观念去生搬硬套地分析并不那么市场化的中国，是幼稚的；无视纠结的现实，用一套理想化的方案去嫁接到中国身上，也是可笑的。任何一个简单、现成和流行的答案，也许都不适用中国，需要告别偷懒思维，脚踏实地地分析。

冰点时评

为官德立法 重建权力伦理

邓聿文

简单地讲，“官德”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做人道德，这是底线；第二个层面是社会公德；第三个层面是职业伦理，也就是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就后者来说，与其他行业从业者的道德相比，官德具有双重性，即官员作为职业道德主体，他既要具备国家管理人员在进行管理活动过程中的职责道德，又要具备作为一个掌权者在权力运用过程中的权力道德。

与古代相比，今天官位的含金量要大得多，官员管理的事情要多很多，权力对社会的影响要广得多。目前，政治权力依然是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源，各级官员掌握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制定公共政策，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水平。同时，民众对各级官员也具有较高的要求和期待，不但要求他们具有较高的组织管理能力和专业水平，更要求他们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职业操守，能够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从这个角度看，官德作为规范权力行使的职业道德，对社会道德有直接的导向性作用，能够引领社会道德发展方向；社会道德风气如何，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各级官员的道德品质和作风如何。

考察中国社会今日道德之溃败，官德不彰，其底线不断降低是首因，而官德如此，又在于以下几点：

一是市场经济的实行使市场的等价交换原则渗透进了权力领域，官员把人民赋予自己管理社会的权力变成一种“奇获可居”的商品，用它来交换利益；

二是政治运作的制度化和法治化程度低，政务不够透明和公开，致使官员在运用权力时，更多是靠道德良心制约自己的行为，缺少严格的制度规制，从而使得官员的道德失范不可避免。

三是现有的官德评价机制不完善，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鼓励不道德行为的存在和蔓延。

此外，民众自身的现代公民意识缺位也是导致官德缺失的原因之一。道德一定程度上是靠舆论来维系的，这就需要民众具有现代公民意识。而现实情况是，许多人还存在着浓厚的臣民意识、“官本位”意识，不能和不敢去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无疑会刺激和膨胀官员的“父母官”意识和权力欲。

目前来看，要想匡正官德，按照行政伦理的要求去管理和服务社会，需建立“教育、制度、监督”三位一体的惩防体系。其中，官德制度的建设起着决定性作用。

官德的养成本质上不是一个“教育”的问题，而是一个“法”即制度建设的问题。教化之目的是让官员深刻理解权力的来源与行使权力的目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把功夫放在官德的制度建设上，用制度和法来约束官员，使对官员行政伦理的规范要求，有效转化为他们的内心道德。

在制度建设方面，有关部门做了不少工作，对官员的政绩考核，也将“德”放在了首位。遗憾的是，仅靠党纪的约束，很难遏制官员的道德滑坡，当下更需要的，是应为官员进行“道德立法”，从法律的角度，为官德祭上一个“紧箍咒”，只有从政治、法律而不仅仅从伦理的角度，去要求官员的德行，官德建设才能取得突破。

这方面，不妨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美国1978年出台了《从政道德法》，对上至总统，下至最低一级公务员的行为，在道德上都作了详细规定和限制。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设立联邦道德规范办公室；第二，规定了行政官员的任后操守问题——即所谓“旋转门”限制(离职后，从行政部门转到私人部门)，规定对高级行政官员离职后实施一年冷冻期，禁止他们以公司顾问或职员名义同其服务过的政府部门进行商务谈判，并禁止其在离开政府一年内为任何事由游说其前任机构；第三，所有总统提名的高级官员的额外收入不得超过其正式收入的15%，行政部门中的几千名高级官员必须申报财产；第四，设立独立检察官制度，专司调查、检控高级行政人员的违法犯罪活动。

从政道德立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预防性规定多于惩罚性规定，法律不单单规定了违法犯罪后的处罚，更多地规定了公务人员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各种情况下何为合法，何为非法。也就是说，从政道德立法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对违法者的处罚，不在于抓住多少腐败犯罪分子，而在于树规矩、明戒律，使监督对象懂得并遵守这些规矩，不去触犯戒律。

中国的国情当然与美国不完全相同，但权力可能引起的贪婪和腐败是一样的。因此，中国应该借鉴其立法经验，加快官德立法进程，从观念、言论、行为三个维度，约束官员道德，保证公众批评、监督官员的权力。特别是要成立类似道德规范办公室这样的机构，负责审查政府各部门的官员因利益冲突而出现的道德腐败，以及公职人员尤其是高级行政人员的财产申报及监督。惟有重建权力伦理，才能扭转日益溃败的社会道德。

“宽带不宽”差一个公益诉讼

国内超半数用户的实际宽带下载速率低于运营商提供的名义宽带速率。业内人士称，国内多地宽带运营商从上一级运营商处购买宽带，再转售给用户牟利。为获得最大利润，宽带公司常用共享带宽冒充独享带宽。（《新京报》10月8日）

漫画：徐　简

毛建国

恐怕很少有人想到，宽带竟然跟高速公路工程一样，也存在层层转包。除却公众熟知的联通、电信等一级宽带运营商外，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二级、三级宽带运营商，以及小区宽带运营商。他们从上一级宽带运营商手里集中购买一定数量的宽带，然后再转售给宽带用户牟利。既然是转包，也难怪“宽带不宽”了。服务商所谓的宽带提速，经过层层利益盘剥，最终到了用户那里，还会有什么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委屈在于，花了宽带的钱，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服务；憋屈在于，服务商告诉你提速了，实际上根本没这回事。非要找一个东西与宽带作类比，个人觉得，刚刚结束收费的郑州黄河大桥有得一拼。

这些年来，针对“宽带不宽”的报告是一个又一个，舆论指责是一声又一声，去年国家发改委还针对宽带垄断展开过反垄断调查。出人意料的是，这么大的舆论压力面前，宽带竟然还是“挂羊头卖狗肉”，不仅远远达不到名义速度，而且在价格上居高不下。这难够不是又一个“桥坚强”吗？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应该相信，在各种压力推动之下，宽带终会有“衣带渐宽”之一天。可是，这一天何时到来？即使到来了，这么多年来的低服务、高价格，难道就蒙了白蒙？

在一个利益空间里，道德常常是无力的。这些年，无奈和无助的舆论，针对“宽带不带”，呈现的多是一些悲情的述说，给予的只是一些道德的压力。“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事实最终证明，单靠道德，难以终结“宽带不宽”。这个时候，更应该寻求外力，来推动“宽事渐宽”。既然已经知道带宽缺斤短两是行业内的普遍现象，那么，监管部门就不应该跟“看客”比看功，而是应该高度介入，迅速启动带宽调查。民间组织，社会力量，也应该聚拥在正义的旗帜之下，帮助消费者维权，维护市场秩序。

刚刚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增加了关于“公益诉讼”的内容。明确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宽带不宽”都可以也应该成为公益诉讼的内容。消协完全可以据此规定，对运营商提起公益诉讼。

在资方强势下，权利不会自动来到，我们不去争取，不公只能延续。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宽带成为又一个“桥坚强”。“宽带不宽”差一个公益诉讼，公益诉讼也需要“宽带不宽”一个机会，以此体现公益诉讼的价值，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黄河大桥收费的合法性问题

杨于泽

河南省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领导小组7日宣布，从8日零时起，郑州黄河公路大桥终止收取通行费，回归公益。针对有关该桥此前违规超期收费的质疑，河南省发改委副主任王红解释，收费是“经过认可的合法行为”。

大桥收费是否合法，若让政府方面的人来裁判，他们自然会自认合法。如果站在“局外人”立场上，这事很复杂：1986年建成通车，到1996年收费还贷完成，收费似乎可以理解。此后收费，已经国家审计署2008年认定为“违规收费”。但河南方面2000年把它转为“经营性收费公路”，而且“经批准”了，意味着2000年以来的收费既是“违规”的，又是“合法”的。

这种情况很滑稽，所谓合法性是由政府自我赋予，而且自我裁判。你说我收费“违规”吗？那咱就埋个表格，履行一下手续，由有关部门盖几个公章，就“经过认可”了，行为“合法”了。加上政府又不是一个统一的政府，而是由许多“有关部门”组成，结果就是依据文件甲合法，根据文件乙又不合法。因时制宜，需要它不合法的时候它就是不合法的，需要它合法的时候它又是合法的，完全满足当地政府政策的灵活性、变通性原则要求。

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叫“合法”？政府“依法行政”之“法”的概念，应指宪法与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它们把政府置于法律框架之下，其根本目的是约束权力、保障权利。依法行政，不能自授合法性。但现在很多政府官员所谓“合法”，其实是“合规”，即符合政府内部某种规定，而这种规定未必符合法律规定。现在很多收费收税项目，都是政府自己授权。内部开个会，定个调调，发一份文件，就成了行政的“法源”依据了。

结果就是“合法性”与“不合法性”同时并存，不仅老百姓看不懂，就是政府部门也理不清头绪，常常无所适从。乍看起来很荒唐，但这几乎成了一种宿命。原因是领导隔三岔五地换，大家的理念、出发点、态度不同，正所谓“有治人”而无一定之“治法”。就是同一位领导施政，也有“世易时移，变法宜矣”之说；或者文件发得多了，自己都记不清了，以至朝令夕改。

这样的合法性，打着“法”的旗号，将“人治”包装成“法治”，实际上是行人治之实。在“法”的旗号下，违规收费振振有词，老百姓不仅折财，而且还输理。但正当你绝望之时，可能又有人援引某个政策条款，来一番“治理整顿”，展示某种“法治”色彩。郑州黄河公路大桥2000年转变成经营性收费公路，本来是“合法”了，但2011年突然冒出一个“五部委”清理收费公路，它眨眼间又不合法了。权力自授合法性的结果，就是百姓权利只可侥幸得之，却不可能得到恒久保障。

“合法”一词用得太滥了，已经失去其代表的权威性与人民认同程度，我的建议是，可将官员口中所谓合法性分成合法与合规，符合宪法与法律者始谓之“合法”，符合政府文件者谓之“合规”，“合规”者不可僭用“合法”的名义。既然有关部门那么在乎自己的合法性，那么实际上是否合法，不能由政府部门自己说了算，凡有所怀疑者可以入禀法院，由司法作出裁决。

游玩后，请带走你的垃圾

严辉文

长假7天，北京市属11家公园共收集了630余吨垃圾，平均每天游人要扔掉90多吨垃圾；公园厕所手纸人均使用量为1.4米，较去年同期有所减少。(中国网10月7日)

这个中秋、国庆黄金周，与熙熙攘攘的旅游者结伴而来的，是旅游垃圾遍地开花。垃圾除了量多（在家上厕所用手纸绝对不要1.4米）之外，最让人头疼的问题就是随手乱扔了。

车辆驶过，道路就是垃圾场，人群游过，景区就是垃圾场。此外，海滩、公园、长城、天安门广场、甚至平时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游人们都毫不客气地将白色垃圾、报纸杂志、口香糖等随手扔下、随口吐出。不论是下意识的、无意识的，还是故意的，反正海量垃圾的出现证明，许多游客对于公德观念、广播电视中的宣传、相关景区管理方的劝导，以及眼前环卫工的弯腰流汗劳动之类，都“不看不视不听不理”。

有人又不免要用国外的例子来说明人的素质的差别了。比如，外国游客昂贵的包包里，都装着自己在景区制造的垃圾，把空水瓶、嚼完的口香糖、剩下的吃食之类带下来。而我们的游客就连对近在咫尺的垃圾桶，也视而不见。

这是不是真意味着国人就真不讲卫生呢？君不见，他们自己家里，是何等光洁照人，他们身上又是怎样清洁无比。节假日，我所在的小区，经常见到楼下四处乱扔的鞋套。这意味着不论是主人还是客人，都很珍惜室内的卫生，客人来了都知道套上鞋套，而一离开那个家之后，就连顺手将鞋套放到楼下的垃圾桶也不情愿，而是习惯于边走边丢。至于小区的草坪，哪怕有“请勿践踏”的提示牌拦着，一些人照样踏出一条条捷径来。还有小区外面的路上，车主们常常将爱车整得一尘不染的同时，又将各种车内垃圾顺手倾倒在路上。

自古以来，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放在同一层面上讨论的曾有一个“扫一屋”的命题。“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典故表明，“扫一屋”对于“扫天下”是很重要的。但与此同时，“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也是言之谆谆的。这样一来，“扫一屋”就不免要变成与“扫天下”相冲突的“扫一屋症”了。所谓“扫一屋症”已经不用我过多解释了，就是人们爱且只爱自己的卫生，简直把自己私人领地之外的地球，都当成了外星人的地球了。这样一来，对于与己无关的地方，采取以邻为壑的态度，就不为稀奇了。

“扫一屋症”显然是狭隘的、自私的、短视的，也是垃圾“公地悲剧”的成因。你自己手里轻松了、包里干净了、车内整洁了、家里清爽了，但是那些遍地的白色垃圾，并未自动降解，反过来同样会影响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心情，甚至我们的身心健康。因为我们不是也不可能成为装在套子里的人，屋是我们的屋，天下其实也是我们的天下，我们不可能总呆在自己家里、车里，我们总要与屋外环境发生联系，我们只扫一屋又有何意义？

最炫“国民”风 可抒情但忌滥情

邓海建

最近，“国民三件套”火了，即床单、枕巾和毛毯。除先前网友晒出的牡丹图案国民床单外，国民枕巾则是牡丹图案上加了“上海”二字的枕巾，而国民毛毯图案则以喜庆的牡丹和凤凰为主，颜色多为绿色与红色。据了解，国民物件多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产，除了因其花色老旧被淘汰外，基本很少出质量问题。（《武汉晨报》10月8日）

“国民系”产品成了一种传奇，在微博、在声屏、在咖啡馆——那是我们一起走过的记忆：缝纫机做出来的衣服，搪瓷脸盆漂洗过的青春，牡丹图案上翻滚过的岁月。数十年过去，沧海桑田，最炫“国民”风唤起了几代人的集体回忆。而近日在上海展览中心开幕的2012中华老字号博览会现场，网络上迅速走红的“国民床单”也再次成为现场的明星。这让人有时光倒流的错觉。

于是有人说这是后工业时代的悲哀：几十年前的产品经久耐用、价廉物美，而今的东西反倒成了“易碎品”；几十年前的款式朴素大方、简洁美观，而今的玩意反倒有些“太流俗”……这样的娇嗔，看似说给市场听，但市场或业主千万不能太多情，以为这就真的是消费心理与消费潮流，那就糟糕透顶了。道理其实很简单，这些对最炫“国民”风趋之若鹜的人群，有几多是真拿计划年代的产品当生计过的？不过是时过境迁，不过是怀旧的票据，就像思念派诗人柏桦说的，“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就譬如你抵死热爱的、陪你度过青春期的歌手，他们不是神，一干人等加起来也拼不过一个“好声音”，但那种美好，只因为一起走过罢了。

因为他们已经不需要用“国民产品”了，所以美好才会肆意狂奔；而那些仍将“国民产品”当生活道具的人，是断断不会真爱在这个时髦年代用着上古的商品——就像游客对原生态景点的艳羡，不过是看风景的心情，你让他过上“枯藤老树”的日子，怕是一刻也要逃离了。那些泛黄的“国民”玩意儿，看看、想想就好了，断不至于有人会飙泪抢购。

“国民系”走红，当然有一些可供寻根溯源的背景：一是2011年底，中国社科院发布《社会蓝皮书》，显示中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城市化水平超过50%。这标志着中国从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业大国，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从计划到市场，从闭锁到开放，匮乏年代的“国民产品”，成了社会转型的“上一个背影”，牵系着与之血脉相连的群体心理；二是与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还在建构之中，大量无关创意与创造的制造业在飞速实现价值的同时，也迷失了制造者本身的灵魂，譬如富士康事件、文化软实力与巧实力的纠结、新生代产业工人的文化迷失等，正如有论者所言，“从《舌尖上的中国》走红，到微博上晒国民床单，人们都在找寻儿时的味道、故乡的味道、返璞归真的味道、被城市的繁华喧闹掩盖的味道”。因为缺憾，所以寻找。

怀旧就是怀旧，与复古是两码事。就像数年前风靡欧美的解放鞋，尽管它有中国风，但它的名字叫Ospop且是改良版。最炫“国民”风，也许顶多就是提醒老字号如何转型，或者为创意营销提供一个速朽的契机，此外，就是浓浓的抒情怀旧味。因为，一般人都不会拿今天号称“纳米级”的床垫，真地去交换一床褪色的国民床单。

焦虑中 无奈的家长“群居”

胡印斌

不怎么用QQ的冯先生，最近一下子加入了5个QQ群。冯先生的好友老田刚刚跟孩子一起经历了小升初，现在孩子已经上了一所心仪的中学。这位好友在传授经验时特别强调，之所以顺利度过“小升初”，多亏了“群”里的信息。一个家长是否尽责的重要指标，是看看他加入了几个“群”。无论是否有意为之，如今的家长已经或正在进入一种线上的、“群居”时代。（《中国青年报》10月8日）

你可以关掉声音，也可以隐身，可那些闪烁着的小头像却让你无处可逃；而与QQ群的喧闹比起来，孩子在现实中的上学难题更是无法回避。不加群，信息来源少得可怜，而且缺乏那种扯动人心的毛茸茸的质感；加了群，大量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与自己之间的差距更让人坠入焦虑之海。这样的情形，想必很多家长并不陌生，即便过来人，在回望时依然会产生深深的同情。

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家长心态，区别之处，只是从以往线下的串联打探，变为在线群聊、穷聊。其所暴露出来的，依然是这个时代难以掩饰也难以回避的焦虑。

要指责这些家长们的过分关怀吗？当然可以。类似指责和质疑一直都不绝如缕，几乎成了很多媒体以及有识之士的习惯性动作。这些年来，也不乏特立独行的家长，通过个性化教育走出了一条子女成功之路。“狼爸”也好，“特别狠心特别爱”的犹太妈妈也好，成功的个案总有成功的理由，只不过，这些个案似乎并没能给那些挤在群里、焦虑的家长们减压。

个中辛苦，仅凭局外人的冷眼观察，很难得到更为深切的体会。以万众瞩目的“小升初”来说，城里的教育行政部门几乎每年都要发布不得进行选拔性考试的文告，以安定人心，这种举动已成例行公事，可如果真的相信文告所说的内容，那你家的孩子注定上不了那些名校。一方面，缺乏公开的信息，小道消息满天飞；另一方面，事实上的选拔依然存在，这个时候，家长相互之间的互通信息，抱团取暖就显得格外重要。

除此之外，身为中国的学生家长，需要相互通气、相互鼓励的事情还有许多，比如，逢年过节要不要给老师表示表示，标准如何掌握？再如，孩子要不要上一些学前班、辅导班，如何选择？如此等等，细碎的事情不一而足，而无论哪一桩哪一件，都需要一一用心打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底气完全拒斥这些“庸俗”的东西。道理很简单，没有人乐意拿自家孩子作为改变社会风气的试验品。可以说，这种面对社会风气时的“无力感”，让众多家长为之气短。

因此，目前的问题，并不是学生家长们愿意“群居”，愿意每天泡在群里，“一刻都不能离开”。家长固然需要改变心态，放松心情，但是，更需要改变的是越来越畸形的教育环境，是越来越扭曲的社会风气。

教育本来最能够体现人群的起点公平，从这里起步，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应该走向精彩，然而，现实的情形却是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教育权利在权力左右下的摇摆浮沉，教育伦理的日渐功利化。而与教育相关的社会风气更是很难真正廓清，尽管个体有责任为风气的改变做出自己的努力，但是，如果将扭转风气的希望完全寄托于个体之上，效果难言乐观。

在这样的大格局下，没有人能置身事外。家长们在群里的执著和焦灼，正是这个时代的焦虑。事关教育公平，社会风气，以及公共生活。